

〔春秋〕

孙

武撰

郭

化

若

译

孙子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前言

孙武是我国古代的大军事学家。他所著的《孙子》，是在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名著。《孙子》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一〕。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几次提到过《孙子》中的名言，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二〕

一九六一年初，我为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写了一篇「代序」，

同时，用作《孙子今译》单行本的前言，后来又移用到《今译新编孙子兵法》作为介绍文，其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够，对毛主席关于对历史遗产要「**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三〕的教导理解得不深，在研究《孙子》和写「代序」时，对于

《孙子》所阐述的军事思想和所反映的哲学思想，以及产生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和阶级本质，未作深入的必要的探讨，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历史分析批判，对《孙子》作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是有害于读者的。一九六五年秋虽作过初步检查，但未能及早改版，深为不安。一九六六年开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也更感到有把错误的「代序」以及《孙子今译》从速改版的必要。几年来对《孙子》进行了重新研究，在许多同志的指教和帮助下，作了反复修改，力图写一篇批判吸

收性的前言，作为对《孙子》的粗浅评介，以改正原「代序」的错误，并把《孙子今译》译文也作了一些修改，加些注释，一并改版（至于《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则征得出版机关同意，停止再版），希望能作为读者阅读这部古代军事著作的一个参考。

（一）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人（生卒年月不详，约和孔丘同时），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六七二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受到齐桓公的器重，用他为「工正」〔四〕，陈完后改称田完。齐国封建生产关系发生较早，到齐景公时，田氏家族已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同公室争夺劳动人手，民众「归之如流水」〔五〕，成为当时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重要力量。据《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田完的后代、孙武的祖先田书，

收性的前言，作为对《孙子》的粗浅评介，以改正原「代序」的错误，并把《孙子今译》译文也作了一些修改，加些注释，一并改版（至于《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则征得出版机关同意，停止再版），希望能作为读者阅读这部古代军事著作的一个参考。

(一)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人（生卒年月不详，约和孔丘同时），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六七二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受到齐桓公的器重，用他为「工正」^{〔四〕}，陈完后改称田完。齐国封建生产关系发生较早，到齐景公时，田氏家族已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同公室争夺劳动人手，民众「归之如流水」^{〔五〕}，成为当时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重要力量。据《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田完的后代、孙武的祖先田书，

因「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今山东惠民）」〔六〕。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家族，对孙武比较进步的思想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后来，孙武从齐国到了吴国。吴王阖闾夺得政权后，利用当时吴国的有利条件，图强争霸。一九七二年临沂汉墓出土的《吴问》残简，记载了孙武和吴王关于晋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问对，孙武认为亩大、税轻者可以「固成」，得到吴王的赞许，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改革图强的思想。公元前五一二年，孙武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同伍员协助吴王经国治军，积极图谋大举攻楚。吴王接受了伍员、孙武的扰楚、疲楚的计谋，组织三支部队轮番袭扰楚国，「楚于是乎始病」〔七〕。经过数年准备，公元前五〇六年，孙武和伍员随同吴王率军攻楚，由水路出发，转陆路，争取了蔡、唐两国，通过它们境内，潜行千余里，迂回到楚国东北部，从侧面袭击，五战五胜，以三万人破楚二十万众〔八〕，攻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

君慎之，良将警之。」它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主张对敌对国家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

《孙子》着重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接着又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七个问题，从前注家把它叫做「七计」。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子》把「道」放在「五事」的首位，把「主孰有道」看作「七计」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那么「道」的含义是什么呢？《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二）这表明「道」的含

义是属于政治范畴的。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当然，《孙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农奴、奴隶和平民，服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去为推翻奴隶主统治和扩大地主阶级势力拚死作战而不怕危险。在反对奴隶主统治这一点上，「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有共同要求；而用封建制去反对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斗争，则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

《孙子》除了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外，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其它基本因素，对天、地、将、法分别作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这些也是《孙子》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

关于军队问题 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推翻奴隶主统治并取而代之，需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建立新的军队。《孙子》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是反映这一需求的。它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

《孙子》很重视和强调将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之中。《孙子》对专职的将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己」、「知天知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料敌制胜」、「通于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要能「令素行以教其民」，要能「与众相得」，使士卒「亲附」等等。《孙子》认为，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国之辅也」、「国之宝」。

也」。当然《孙子》这里所说的「国」，是指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所说的「智、信、仁、勇、严」，也是新兴地主阶级选将的标准或要求。

《孙子》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它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文」，就是怀柔 and 重赏，使士卒亲附；这「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孙子》提出「视卒若爱子」，目的是要使他们去拚死作战；对俘虏提出「卒善而养之」，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更加壮大自己。《孙子》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级同农奴、奴隶及其他贫苦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卒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军队内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所谓「爱卒」、「善俘」，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三)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三〕这就给我们指出《孙子》中最主要的精华，也给我们作了一个批判吸收古代历史遗产和「古为今用」的示范。

《孙子》把「知彼知己」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对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七计」要熟知深究，要估计、比较敌对双方的优劣条件，这样才能在战前判明谁胜谁败，才能制订正确的作战方针。《孙子》在论「用间」中，主张不要吝惜「爵禄百

金」以取得敌军情报。指出「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把了解敌军内情看作是决定整个军队行动的一个重要依据。

《孙子》把「知彼知己」贯穿于战争指导的全过程。在战前，它十分重视「庙算」的作用，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在作战中，《孙子》要求从进军开始就注意观察各种征候，到同敌人接触就更注意观察，并根据各种征候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孙子》把敌情判断叫做「相敌」，并举出三十二例，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告诉人们要从敌人的行动中区别真象和假象，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而要从现象深处发现敌人真实的意图。我们知道，战争经常处在纷乱、复杂、多变的情况中，加上敌人的伪装和佯动，比其他事情更带不确实性，因此，通过这样的情况（现象），去探求敌人行动的意图（本质），就更加困难而又更加需要了。《孙子》的敌情判断，虽是古老而简单的，

但提出了指导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也给当时将帅指出了从复杂的现象中去探索敌人真实企图的方法。

为了判明情况，它还要求「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就是说要用心筹算，以求了解计策的得失利害；激动敌军，以求了解敌人的动静规律；侦察地形，以求了解哪里有利哪里不利；较量力量，以求了解哪方面优势哪方面劣势。总之，《孙子》要求在进军、接敌、对峙、交战等战争全过程中，都要查明和判断敌情。

《孙子》还多处论述了「知彼知己」与战争胜败的关系。它说：「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又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

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还提出「将有五危」、「兵有六败」。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战争指导者应该了解的彼己双方的情况，了解全面和指导正确的就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所以它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中一系列作战原则，如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指导等，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思想为基础的。

在作战方针上，《孙子》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胜，不贵久」，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政治上要求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经济、军队组织等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一般战争的规律，偏重于讲进攻速胜，不重视防御和持久，是带有片面性的。为了达到进攻速胜的目的，在具体作战上，《孙子》主张要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要「并气积力」、「并力、料敌、取人」、「并敌一向」。《孙子》要求进攻行动的突然性，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要「避实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所谓「虚」，是指敌人的弱点。《孙子》的进攻作战，主张速决。它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要求军队的行动要「其疾如风」。它注重造势，造成有利的进攻态势，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要造成象湍急的水奔流倾泻，以至凶猛地冲走石头那样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

在作战形式上，《孙子》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它把「伐兵」放在「攻城」之前，把「攻城」看作下策，以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反映当时进攻兵器还缺乏摧毁城堡的能力，攻城所费代价过大，每每导致旷日持久，不利于速胜。所以《孙子》主张「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似指奇袭和久困）。「伐兵」，就是进攻敌人的军队，照现代的军事术语说，就是以军队为作战目标。进攻敌人的军队，也有不同的打法。当时，呆笨的车战已逐步让位给徒步作战，而《孙子》主张的「勿击堂堂之阵」，

正是新兴地主阶级寻求新的作战方式的表现。《孙子》认为野外机动作战是达到进攻速胜的有利的作战方式。要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消灭敌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调动敌人，这种调动敌人的办法，《孙子》称之为「动敌」。它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就是说，要善于用佯动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使敌人听从调动，用重兵来等待掩击它。对于固守高垒深沟的敌人，则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调动敌人出来消灭它。《孙子》要求「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就是进军向敌人不及救援的地方，急进向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这样就能「进而不可御」了。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强调「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就含有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意思。为达此目的，就要察明敌人的情况和行动规律，而不让敌人了解自己的情况和规律，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这样就「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了。《孙子》还提出，要「先为

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先要消灭自己的弱点，立于不败之地，以寻求消灭敌人的机会。而在待机中，就要「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佚（逸）待劳，以饱待饥」。《孙子》还强调「我专而敌分」，就是要设法使自己兵力集中而迫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样就有争取主动的力量，能够造成「以十攻一……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孙子》提出了造成敌人过失，使敌人陷于被动地位的办法，如「示形」，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毛主席说过：「……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孙子》又如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办法，都能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使敌人发生弱点，陷于被动。同时自己则保持主动，使自己的进攻象「转圆石于千仞之山」那样锐不可当，能所向无敌，即所谓「兵之所加，如以礲（石）投卵」。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还强调「兵因敌而制胜」，这里含有灵活机